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是从昆德拉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第一次接触到贡布罗维奇这个名字。昆德拉多次提到他,对他大加赞赏,并将他同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齐尔并称为“中欧四杰”——高傲的昆德拉痛恨被人称作东欧作家,反复强调自己属于中欧文学传统。

读过显克维奇、莱蒙特、伊瓦什凯维奇等波兰作家,再来读贡布罗维奇,会感到巨大的差异,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学世界——至少在表面上——充满了荒诞、想象和游戏。贡布罗维奇以剧作登上波兰文坛。在20世纪20年代,他代表了波兰的荒诞派戏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性引入了波兰文学。可惜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兴许同他的人生遭遇有关,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荒诞。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的地主家庭。田野、家庭教师、家庭图书馆伴随了他的童年。十来岁时,他随父母迁居华沙。上中学时,他喜爱波兰文和法语,厌恶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时常交白卷。16岁时,贡布罗维奇就有写作冲动,想用文字描绘家族历史,但最初的作品“由于过分稚嫩”被自己打入冷宫,从未发表。1923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但对专业毫无兴致。大学毕业后,他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任见习律师。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只不过,他用另一种目光看待这些人:“我从来就分不清谁是法官、谁是犯人,有时还会同犯人握手。”正是在法院工作时,他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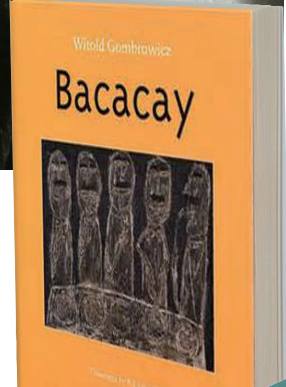
1937年,贡布罗维奇写出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但这部作品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反倒为他招致了敌意。1939年,他航海旅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料,二战爆发,他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24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居无定所、穷困潦倒,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度日。反叛个性使他始终无法接近阿根廷正统的文学界,用他自己的话说,甚至都忍受不了那些年龄超过二十七八岁的作家。有一段时间,贡布罗维奇生活得极为空虚和荒唐,在找到银行的工作后才稍稍稳定,继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轻歌剧》,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春宫画》《宇宙》等重要作品。

1950年,贡布罗维奇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还在巴黎出版了几乎所有作品以及三卷本《日记》,开始为世人所瞩目。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文学通行证”。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也开始重新打量他的作品。他的同胞、定居美国的诗人米沃什曾写过洋洋数万字的论文,告诉世人“谁是贡布罗维奇”。

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再次改变了贡布罗维奇的人生轨迹。他回到了欧洲,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式开始了。关于阿根廷,他直率地说,他只是想爱它,可惜并没有爱上。

回到欧洲后,贡布罗维奇陆续在柏林和巴黎生活,却始终

《巴卡伊大街》



《巴卡伊大街》



《费尔迪杜凯》

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害群之马”是昆德拉给予贡布罗维奇的最高评价。昆德拉眼中的害群之马还有:文学家塞万提斯、狄德罗、卡夫卡、布洛赫、穆齐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等等,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中不受疼爱的孩子”。

贡布罗维奇压根儿没指望得到“疼爱”。他从一开始就决裂,同传统决裂,同模式决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夸张、扭曲、怪诞;人物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

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贡布罗维奇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这是一部语调嘲讽、手法夸张、人物滑稽的小说。小说中的尤瑟夫是位年过三十的作家,总是用在常人看来“不成熟的”目光打量一切——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清醒。正因如此,他的目光从本质上看是绝对怀疑和悲观的。他明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出现,无论什么事永远都不会到来,无论想干什么都不成,无论想采取什么步骤都是徒劳”。这种意识让他时刻感到“一种非存在的畏惧、非生存的恐怖、非生命的不安、非现实的忧虑”。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越是愚钝狭隘的见解,反而越是重要迫切。这样的人,自然为社会、为那些书中常常提到的“文化姑妈”所不容。于是,老师平科强行将他变成十几岁的少年,逼迫他返

##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 孤独,却自命不凡

□高 兴

回学校,也就自然而然了。一连串荒唐有趣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作者在写作时完全打破了所谓的“使命感和庄严感”,采取极端随意的、不正经的笔调。比如,作者将月亮描绘成“挂在天上的屁股”;“这时那超级屁股升上了高空,向世界洒下千万道令人目眩的光芒,而这个世界宛如世界的仿制品,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给涂上了一层绿色,并被上方熊熊火焰所照亮。”在词汇的使用上,贡布罗维奇也突破禁忌,最俗最糙最反美学的词汇都敢用,甚至还生造词汇。小说几乎没有心理描写,只有行动,用行动揭示人物心理,塑造形象。在讲故事的间隙,作者又时常以主人公的口吻发表奇谈怪论。细细琢磨,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深刻而又前卫的思想。作者甚至在小说的最后声明:谁若去读它,谁就大大受骗。这种精心的“随意”、“出格”和“自我贬损”使作品获得了无边的时间和空间,想象的天地也就异常广阔。书中两个学生敏透斯和塞夫的鬼脸决斗,还有高级综合专家非利陀尔和高级分解专家反非利陀尔的较量,谁都不会轻易忘记。但读者也不要被作者表面的“不正经”所迷惑。事实上,针对人性和社会的寓意及批判在书中处处可见。虚伪的教育家、短视的文化界、肤浅的“半知识分子”、贪婪脆弱的地主乡绅及其他各色人等都成为作者讽刺、嘲弄和揭露的对象。作者在讲述一个人物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那么多疾病,矛头难道不是指向整个社会吗?

读贡布罗维奇总让我想到昆德拉;读昆德拉也总让我想到贡布罗维奇。他们太多的共同之处:来自中欧,有相似的文学背景;阴差阳错陷入流亡的境地;主要以长篇小说立足文坛并享有声誉;只写过为数不多的短篇,而且严格说来,只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们的小说都充满着某种游戏性。

游戏性意味着打破所谓的庄重和神圣,解构所谓的意义,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对贡布罗维奇来说,游戏性最能表现文学的独立自主。游戏性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不正经,翻开短篇小说集《巴卡伊大街》,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都不太正经。贡布罗维奇的诸多小说说到底都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且是不太正常的关系,他对正常的关系不感兴趣。不正常才有游戏性的空间和更多文学上的可能。《检查官克拉伊科夫斯基的舞伴》是篇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也颇能代表贡布罗维奇的风格。小说中的“我”如此形容自己:卑微,僵化,柔弱无阻,且已病入膏肓,顶多活不过一年。看戏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理由,歌剧《吉卜赛公主》他竟然看了30多遍。然而,就在他准备看第34遍时,由于求票心切没有排队,被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一把提溜出来。如此,“我”与检察官产生了关系。“我”自尊心受伤,决意报复。但“我”是如何报复的呢——恰恰将卑微和谦恭当作了武器。“我”寻找各种机会跟随检察官,向他献花,为他付蛋糕钱,和他进同一家餐厅,给检察官追逐的女士写纸条鼓励她接受求爱……检察官终于恼羞成怒,举起拳头时“我”却主动弓腰献上脊梁。卑微和谦恭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利器,具有无限的杀伤力。《斯特凡·哈尔涅茨基的回忆》中,“我”的成长受到父母关系的深刻影响。“我”很早就注意到,父亲厌恶甚至仇恨母亲,常常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母亲。对于“我”来说,生活之谜从这里开始,“这个谜散发出的团团迷雾让我陷入道德的灾难”。家庭、学校、战争、情感等因素最终将“我”塑造成“道德沦丧的人”,或者说,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在“我”看来,“所谓爱情实际上和打斗有诸多相似。两个人打斗不也是又捏又掐,或者抱在一起撕扯”。最终,“我”竟建立了自己的主义,并提出纲领:“我要求,把我的母亲切成小片,凡是没有足够热情祈祷的人,都可以分到一片。父亲也一样,把他交给那些没有种族观念的人,分而食之。”我还要求所有的微笑,所有的美貌和优雅都按需分配。至于无法证明正当的憎恶统统关到‘惩罚室’,严惩不贷……贯彻纲领的方法主要由咯咯咯尖笑和眯细眼睛看人这两部分组成。”简直是太不正经了!可从这种不正经中,读者又可领悟到多少丰富的意味。我个人最喜欢的《宴会》是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



《横渡大西洋》波兰文版和中文版

的精品。它涉及君臣关系。卑鄙丑陋的国王即将举行婚礼。大臣们为了阻止他给王国蒙羞,只好借助沉默和模仿这一武器;国王站起来,大臣们也都站起来;国王坐下,大臣们也都坐下;国王打碎两只盘子,大臣们也都打碎两只盘子;国王跳起来,大臣们也都跳起来,国王捏死公主,大臣们也都捏死身边的夫人;国王惊恐逃跑,大臣们也都跟着他逃跑……耐人寻味的一幕出现了:在民众看来,“这位超越一切的国王,正率领着他超越一切的军队,在做一次超越一切的冲锋”。游戏性需要天赋,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天地,游戏性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深刻思想的最好表现。

贡布罗维奇肯定是昆德拉的老师,他教会了昆德拉文学中的游戏性。昆德拉自有聪明和狡黠之处,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在他内心培育出一种怀疑精神,而游戏性和不正经成为表达和散发这种怀疑精神的最有效手段。对于文学来说,怀疑精神更为宝贵,它反过来又将游戏性提升到近乎神圣的高度。

贡布罗维奇始终认为,“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也就难以避免。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在祖国一直受冷落,一段时间甚至还被禁止出版。他同波兰知识界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以至于35岁离开波兰后,再也没有回国。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阿根廷对他来说,也不是一块文学乐土——事实上,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那里的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享受到一点应有的评价和声誉。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同样散发出浓厚存在主义气息的《费尔迪杜凯》实际上比萨特的《恶心》要早,但他却没有获得萨特那样的声望——是战争耽误了他,是流亡耽误了他。

其实,流亡是贡布罗维奇的宿命。他自己也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的流亡、他的非波兰性,使得他进入更大的视野。因此,他是世界的。

## 瞭望台

### 《法兰西帝国玫瑰》:

# 一朵奇异玫瑰的盛开和凋零

□晓 雪



对于波利娜·波拿巴,我们所知甚少,顶多会想起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创作的那尊名为《波利娜·博尔盖塞夫人像》的大理石雕塑。英国女作家弗洛拉·弗雷泽则通过传记《法兰西帝国玫瑰》将波利娜·波拿巴还原为活生生的人。

波利娜·波拿巴是拿破仑最宠爱的妹妹。无与伦比的美貌和特别的身份给了她巨大的自信和优越感,也使她的自我急剧膨胀。

关于她的美,书中从不同人的角度描述,比如:波利娜有一种特殊的美,那是古典美与致命诱惑的混合,这种混合对于见过她的人都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身材容貌的完美和个性品行的怪诞在她身上形成最充分而诡异的结合”。波利娜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她的家族一度曾陷于近乎准民的境地,拿破仑的发迹改变了一切。波利娜就是带着暴发户心理和特征步入当时的

上流社会的。反差、矛盾和种种不和谐便自然而然地在她的身上显现:“虽然她的美貌令人惊叹不已,但她却是一个最不可理喻的女人……她说话没头没脑,信口开河……在那种场合里,她的浅薄幼稚和在座其他人的端庄肃穆形成最为鲜明的对比。”

讲究实际又热爱自由是波利娜的天性。她任性、奔放、自私、无视道德规范,注重虚荣,挥霍无度,注重生活享受,沉湎于快感,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但若说这就是波利娜的全部,显然有失公允。波利娜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她敏锐的直觉和判断能力,她对第一任丈夫勒克莱尔的深情、对哥哥拿破仑的爱慕和忠诚,都让我们看到了波利娜的另一面。当兄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时,波利娜动情地说:“对皇帝,我没有尽我最大的可能爱戴他,但是,对哥哥,我永远还有一份忠诚。皇帝要从这里经过,我必须给予他安慰,如果他愿意,我会跟着他去厄尔巴岛。”她说到做到,甚至还鼓动母亲一起去小岛陪伴失落的拿破仑。在拿破仑力图东山再起却最终失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波利娜竭尽全力试图跟随,未获准允后,她又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渠道,改善拿破仑的处境。最后,当拿破仑的死讯传来时,家族中,只有波利娜最伤心,她久久沉浸于悲伤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她的重情重义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的冷静和从容令人敬佩。

简单的道德评判,难以深入人心的最幽深处。我们只能说,波利娜是一个复杂的女人、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有趣的女人、一个特殊时代和时势造就的女人。复杂,才有无限想象的空间,才符合人性的真实。作者为

深入发掘这一人物做了大量的准备:研读史料和书简,实地采访考察,甚至还从大量野史和轶事中发掘线索。她尽力秉持客观的立场和严谨的态度,对于真实史料和含糊传说区别对待,并加以说明。叙述又十分讲究文采、节奏和起伏,具有较好的艺术性和可读性。每一章节的末尾,作者都会有意提出一些问题,或设置一些悬念,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中国的章回小说每章末尾那著名的句子:且听下回分解。弗雷泽深谙细节的力量,用心发掘和提炼出大量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支撑起波利娜等人物,也让整个传记变得生动。顺便说一下,弗洛拉·弗雷泽的家族有深厚的文学渊源,她的祖母是一位知名的传记作家,而她的继父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弗雷泽曾于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研读古典文学。她对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尤感兴趣,创作并出版《汉密尔顿夫人》《卡洛琳皇后的一生》《乔治三世的六位女儿》等传记作品。《法兰西帝国玫瑰》(重庆出版社出版)是弗洛拉·弗雷泽历经4年完成的心血之作。

《法兰西帝国玫瑰》既是讲述波利娜的,也是讲述拿破仑的,同样也是讲述那个特殊时代的。在相当程度上,拿破仑的命运也就是波利娜的命运,时代的风云际会从一开始就将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部传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女人短暂而奇特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拿破仑跌宕起伏的命运,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画卷。传记超越了传记本身,从而获得了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 书 讯

### 植村直己《远山在呼唤》

中译本出版



日前,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的作品《远山在呼唤》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该书是植村直己不断挑战自己、创造传奇之后关于人与自然、梦想和人生的思考。

作为日本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全球首位登顶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植村直己已成为全球登山爱好者心目中不可逾越的高峰。《远山在呼唤》是植村直己年轻时只身登顶五大洲最高峰和一

系列探险历程的全记录。当年,怀揣110美元和登山的梦想,植村直己勇敢地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攀登生涯。植村直己始终心中的跃动与攀登,凭着“只要有信念,就能做到一切”的信心,不断挑战人类的可能性和极限,书写了一段段壮阔人生。书中不乏艰辛却鼓舞人心的追梦细节,被称为“一本绝无仅有的书,一本令人心生温暖、颌首微笑的书”。(世 文)



波兰画家Kuczyński的讽刺画作品